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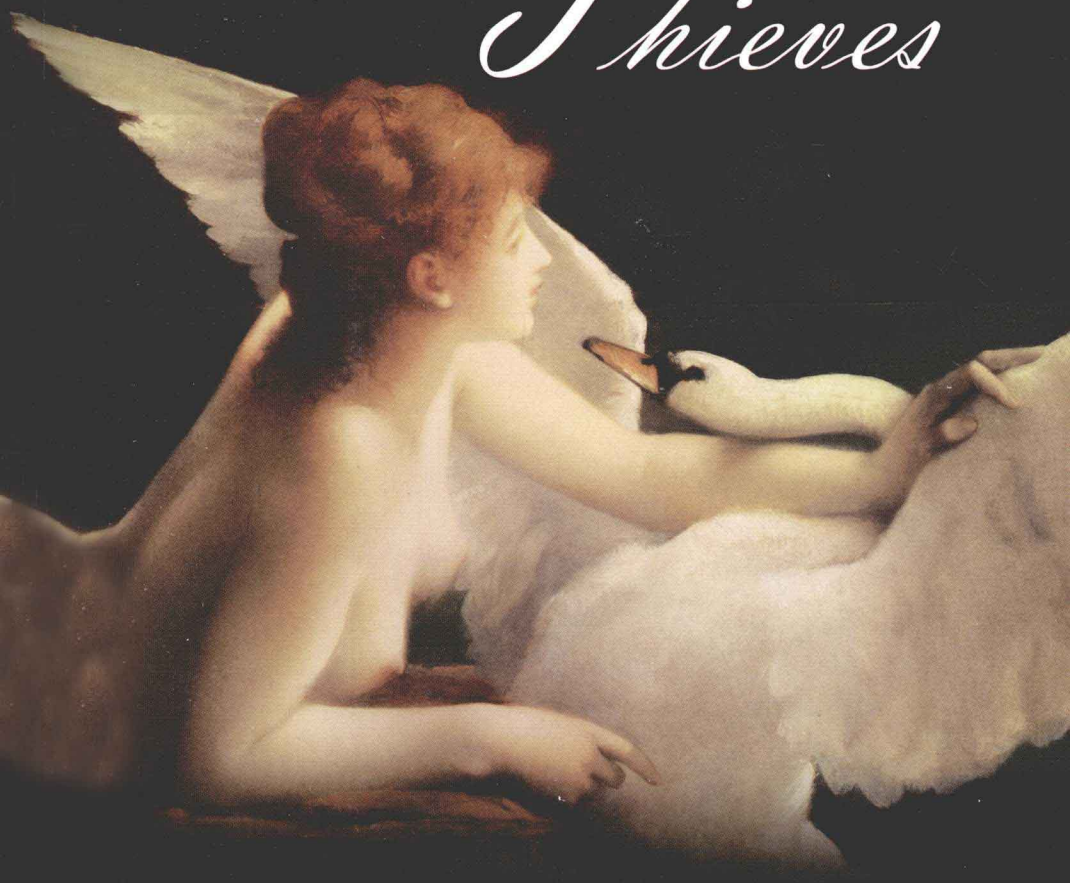
Elizabeth Kostova

# *The Swan* 天鹅贼

*Thieves*

(美) 伊丽莎白·科斯托娃 著

沈亦文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Elizabeth Kostova

*The* 天鹅贼  
*Swan*  
*Thieves*

(美) 伊丽莎白·科斯托娃 著

沈亦文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 01-2012-9253

Elizabeth Kostova

THE SWAN THIEVES

Copyright © 2010 by Elizabeth Kostova  
This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New York, New York USA.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鹅贼/(美)科斯托娃著;沈亦文译. —北京:人  
民文学出版社, 2014

ISBN 978-7-02-009776-0

I. ①天… II. ①科… ②沈… III. ①长篇小说-美  
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 045655 号

特约策划:彭 伦 欧雪勤  
责任编辑:苏福忠  
封面设计:汪佳诗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阳区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制 宁波市大港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380 千字  
开 本 890 毫米×1240 毫米 1/32  
印 张 15.25  
版 次 2014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09776-0  
定 价 4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 电话:010-65233595

献给我的母亲，一个好妈妈

你或许难以相信，在一张画布上呈现一个单独的人物，并且把所有的心力放在这个唯一和典型的人物身上，让它生动鲜活起来，有多么困难。

——爱德华·马奈<sup>①</sup>，一八八〇年

---

① 爱德华·马奈(1832—1883),法国写实派和印象派画家,作品包括《草地上的午餐》,这幅画在当时引起了极大的争议。

村子外有一堆柴火，熏黑了正在融化的白雪。火圈旁边有一个放置了数月的篮子，颜色渐渐褪成了暗灰。那些老人围坐在长椅上暖手——此刻即便是取暖也太冷了——天太过接近于暮色，太过阴沉。这不是巴黎。空气中弥漫着烟雾和夜空的气息，一轮惨淡的琥珀色夕阳下沉到树林里，几近西下。夜色的降临如此迅速，以至于离废弃的火苗最近的窗户里也早已亮起了灯光。那是一八九五年的一月或二月，或者是阴冷的三月——这个年份会用黑色潦草的数字标记在一个角落的阴影上。村子各家屋顶都是石板铺成的，把上面沾着的、正在融化的积雪分成一堆又一堆。村里有的小巷夹在高墙之间，而有的则两边面向田野和泥泞的园子。各家都紧闭房门，饭菜的香味从烟囱里袅袅飘出。

这个冷冷清清的地方只有一个人在走动——一名身穿厚重旅行服装的女子正在沿着一条小巷走向最后面的房子。那里也点着灯，远远的窗口映出一个模糊的人影俯身凑近火堆。巷子中的女子举止高贵，她穿的不是村里人常穿的破旧围裙和木底鞋。她的斗篷和长裙在蓝紫色的雪中颇为醒目。她的兜帽镶着毛边，只露出她白皙脸颊的一道弧线。她的裙子边缘是浅蓝色的几何图形。她双手抱着一个包得严严实实的包裹，像是怕它着凉。树木的枝条麻木地伸向天空，并框出了这条路。巷子尽头的房子门前的长椅上有人落下一块红色的布——像是一条披肩或是一块小桌布，这是唯一一抹亮丽的色彩。那名女子用双臂和戴着手套的双手护住包裹，尽可能快地背离村子的中央前行。她的靴子咔咔地踏在路面的冰块上。她呼出的气在越来越浓的黑暗中凝成白雾。她蜷起身子，紧张而小心地赶路。她是要离开村子还是去往最后一排的某栋房子？

就连看着她的那个人也不知道答案，更不在乎。一整个下午他都在干

活，在小巷两边的墙里敲钟，放置光秃的树木，测量道路，等待着冬天日落的那十分钟。这名女子是外来者，但他也很快注意到她，发现她衣着的细节，借用越来越暗的天光来画下她戴着兜帽的侧影，她蜷身取暖或是掩盖包裹的样子。无论她是谁，这都是一个美丽的惊喜。她是一个遗失的音符，在堆着尘土斑斑的积雪的道路中央，他需要填上这么一段韵律。他早就隐退了，现在只是在屋里创作——他老了，如果在户外的严寒中作画超过一刻钟，四肢就会疼痛——因此他只能想象她急促的呼吸，踏在路上的脚步，以及在那尖尖的靴子后跟下咯吱作响的雪地。他正在衰老，疾病缠身，但有一刻他希望她转过头直视他。他想象着她的头发应该是又黑又软，嘴唇是朱红色，眼睛大大的，满是机警。

但她并没有转过头来，他觉得很庆幸。他希望她就是这个样子，需要她越走越远，而进入画布中积着雪的巷子里，需要她那挺直的背影和边缘精致的厚重长裙，还有她怀抱着包裹的样子。她是一个真正的女人，忙着赶路，但此刻她永远地定格下来。此刻，她凝固在她的匆匆行色之中。她是一个真正的女人，此刻也成为一幅画。



一九九九年四月，我接到电话，获知罗伯特·奥利弗的事情。不到一星期之前，他企图将一把小刀捅进国家美术馆收藏的一幅十九世纪画作中。那天是星期二，当春天早已带来似锦繁花，甚至微热的天气时，有几天上午却很糟糕，气温突降，天色低沉，冰雹肆虐，雷声隆隆，当天上午就是这样。同时，那天碰巧是科罗拉多州利特尔顿哥伦拜恩高中枪击案<sup>①</sup>发生的一周之后。我依然在专注地思考着这起事件，我猜全国的精神科医生都是这样。我的办公室里满是那两个带着枪管锯短的猎枪、着了魔似的满腔愤怒的年轻人的影子。我们究竟哪里辜负了他们以及他们枪下更多无辜的受害者？极端的天气状况和举国的低落情绪在我看来引爆了那个早晨。

电话铃声响起，我接起电话，那一头传来朋友及同行约翰·加西亚医生的声音。约翰是个正人君子，出色的精神科医生——多年前曾是我的同窗，如今不时约我出去到他选的餐馆吃午饭，并且很少让我买单。他在华盛顿一家大医院负责急诊和住院病人，同时，和我一样，也接待私人病患。

此刻约翰告诉我，他想把一个病人转到我这里，让我治疗，我听得出他语气中的急切。“这个人可能是个棘手病例。我不知道你会怎样对待他，但是我更希望他能去金树林接受你的治疗。实际上他是位画家，非常成功的画家——上星期他害得自己被捕，接着警察把他交给了我们。他沉默寡言，不太喜欢我们和这个地方。他叫罗伯特·奥利弗。”

---

<sup>①</sup> 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日，美国科罗拉多州利特尔顿的哥伦拜恩中学发生一起震惊世界的惨案。两名高中生持枪杀死了十二名同学和一名老师，随后开枪自杀。在这起案件中，另有二十三人受伤。

“我听说过这个人，但确实不了解他的作品，”我坦言，“风景画和人物肖像——我记得几年前他上过《艺术新闻》的封面。他为什么被捕？”我转向窗子站了起来，注视着犹如高贵白色砂砾的冰雹，铺天盖地地坠落在围墙内的后院草坪和一棵已被砸伤的玉兰树上。草地早已泛出大片鲜绿，而一瞬间，一道如水的阳光洒向万物，接着又是一阵猛烈的冰雹。

“他企图破坏国家美术馆的一幅画，用一把小刀。”

“一幅画？不是一个人？”

“这个嘛，当时房间里似乎只有他一个人，但随后一名警卫走进来，看见他朝一幅画刺去。”

“他们是不是打了起来？”我看着冰雹消融在鲜艳的绿草中。

“是的，他最后把刀扔在地上，但接着抓住警卫一阵猛烈摇晃。他身材魁梧。然后，不知怎么的停了下来，任由别人把他带走。美术馆方面在考虑是否要以伤害罪起诉他。我想他们会放弃，但他还是有可能被抓起来。”

我又注视着后院。“国家美术馆的画是联邦政府的财产，对吗？”

“对。”

“他拿的是什么刀？”

“就是把小折刀。没什么惊世骇俗的，但他可能会造成很大的破坏。他很激动，认为自己的做法是英雄般的壮举。接着在警察局里他彻底崩溃，说他好几天没有睡觉，甚至还哭了一会儿。他们把他带到精神科急诊室，我收下了他。”我听得出约翰在等我答复。

“这个人多大？”

“他还算年轻——好像四十三岁，现在这年纪在我听来就是年轻人，你明白吗？”我明白，并笑出声来。两年前刚过五十岁的我们都像是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于是和几个同病相怜的朋友一起庆祝了一番。

“他身上还带着另外几样东西——一本写生本和一捆旧信件。他不许别人碰。”

“那么你希望我为他做些什么？”我靠在书桌上放松下来。一个漫长的

上午即将过去，我感到饥肠辘辘。

“就是接收他。”约翰说。

但一种习惯性的谨慎深深地渗入我们的职业中。“为什么？你想给我再添一件烦心事？”

“哦，拜托。”我听得出约翰笑了。“我知道你从来不会把一位病人拒之门外。‘好好医生’，这个人值得你花时间。”

“因为我是画家？”

他稍稍迟疑了一下。“坦白地说，是的。我不能假装我理解艺术家，但我认为你会理解这个人。我告诉你他沉默寡言，我的意思是，我从他嘴里挖出了不过三句话。我觉得他在抑郁中挣扎，尽管我们已经开始对他用药。他还显示出愤怒和一阵阵的躁动。我很担心他。”

我的目光移过大树、青翠欲滴的草坪、零零星星正在融化的冰雹，又回到大树上。那棵树矗立在后院的中央略微偏左的地方，隔着窗，它那紫色和白色的蓓蕾在阴暗的天色下呈现的光泽，是阳光中不曾有的。“你们对他用了什么药？”

约翰报出一个单子：一种情绪稳定剂、一种抗焦虑药和一种抗抑郁药，都是较大的剂量。我从书桌里取出一支笔和一本便笺纸。

“诊断呢？”

约翰告诉了我，而我并不吃惊。“对我们来说，幸运的是，他还肯讲话的时候，在急诊室签了一份信息许可书，他大约两年前在南卡罗来纳看过一位精神科医生，我们刚刚从他那里拿到了病历。显然那是他最近一次看医生。”

“他是否存在强烈的焦虑？”

“嗯，他不愿意谈这个，但我看得出来。根据记录，这不是第一轮药物治疗。事实上，他到这里的时候外套口袋里还有一瓶两年前配的抗惊厥药氯硝西洋。很有可能不用情绪稳定剂，他就不见好。我们最后联系到他在北卡的妻子——实际上是前妻——她讲了更多有关他过去治疗的事情。”

“有自杀倾向?”

“有可能,既然他不肯多说,就很难恰当评估。他不仅仅是愤怒。就像是一头被关在笼子里的熊——一头不出声的熊。但就因为这种表现,我不想就这么把他放走。他需要在某个地方待上一段时间,有人来弄清楚究竟出了什么事,他的药物需要作微调。他确实是自愿签字的,我敢说他这个时候很愿意离开。他不喜欢这里。”

“这么说你认为我能让他开口?”这是我们一个往日的玩笑,约翰显然觉得很亲切。

“马洛,就算是块石头,你也能让它开口。”

“谢谢你的恭维。还要特别感谢你打扰了我的午休时间。他有保险吗?”

“有一些。社工正在研究这个。”

“好的——就把他送到金树林来吧。明天两点,带上相关资料。我会安排他住院。”

我们挂上电话。我站在那里,想着能否挤出五分钟吃饭时间画个素描。当日程安排很紧的时候,我总是喜欢这么做。我在一点半、两点、三点和四点都有约诊,五点有个会。明天我要在金树林待上十个小时,这是我过去十二年来工作的私立医疗中心。此刻我想来点汤和色拉,还需要一支铅笔在我手指上逗留几分钟。

我也想起某件忘了很久的事情,虽然这件事我过去常常想起。二十一岁那年,我刚刚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在那里我修完了历史学、英语和自然科学),并已经进入弗吉尼亚大学医学院,我的父母主动给我一笔钱,足以让我和我的室友到意大利和希腊旅行一个月。那是我第一次走出美国。意大利教堂和修道院里的绘画,佛罗伦萨和锡耶纳的建筑,令我深感震撼。在希腊帕罗斯岛——世界上半透明白色大理石的最佳产地——当地的考古博物馆里只有我一个人。

那座博物馆里只有一尊贵重的雕像,单独摆放在一个房间里。那是一

尊胜利女神像，约五英尺高，残缺不全，没有头部和手臂，原本长着翅膀的背部只留下疤痕，由于长期被埋在岛上的泥土中，大理石上沾着红色的污点。但你还是看得出精湛的雕刻技艺，衣裙犹如漩涡状的水流裹在她的身上。她的一只小巧的脚已经被补上。我独自待在房间里，把她画下来，这时警卫走进来大叫：“快合上！”他离开之后，我包起画画的用具，接着——完全没有想到后果——最后一次靠近胜利女神，俯身去亲吻她的脚。警卫迅即上前怒吼着，实际上他还抓住了我的领子。我从来没有被人扔出过酒吧，但那天，我被扔出了一座只有一名警卫看守的博物馆。

我提起电话，回给约翰，幸好他还在办公室里。

“那是幅什么画？”

“什么？”

“你的病人奥利弗先生攻击的画。”

约翰笑了。“你知道，我不会想到问那个，但警方的报告中写了。那幅画名字叫《勒达》，关于一个希腊神话的，我猜。至少我一下子想到的就是这个。报告中说画的是一个裸女。”

“被宙斯征服的女人之一，”我说，“宙斯变成一只天鹅来接近她。那是谁画的？”

“哦，拜托——你怎么把这事儿搞得像《美术史一百二十五题》。顺便说一句，这门课我没及格。我不知道是谁画的，我怀疑逮捕他的警官也不知道。”

“好吧。回去工作吧。祝你今天愉快，约翰。”我一边说，一边试着弯起脖子夹住听筒。

“你也是，我的朋友。”

## 二

马洛

我早就有一种冲动，渴望回顾这段历史，坚称这是一个私人的故事。不仅涉及个人隐私，而且我的想象和事实八九不离十。我花了十年的时间整理和归纳我在这个案例上做的笔记以及我的思绪。我原先考虑为一份我最为敬重、我过去也发表过作品的精神病刊物，撰写有关罗伯特·奥利弗的文章，但谁会出版最终可能危害这个职业的东西？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斥着脱口秀表演和信口开河的时代，但我们的职业特别严格地要求保持沉默——谨慎、合法、负责。做到最好。当然，也存在这样的案例，其中起到关键作用的是智慧而不是规则，每一位医生都知道这种特别病例。我已经做了防范，把这个故事中相关的一切人名都改掉，包括我自己的，除了一个非常常见的名字——现在在我看来依然如此美丽——我认为这对于故事本身并没有坏处。

我并非成长于医学世家：我的父母都是牧师——实际上，我母亲是他们那个最小的教派中第一位女性牧师，她被任命的时候我十一岁。我们住在康涅狄格州一个镇上一栋非常古老的建筑中，一栋有着低矮的屋檐、栗色封檐板和前院活像英式墓园的房子，金钟柏、紫杉、垂柳和其他墓园里常见的树木争相簇拥在通往前门的小路两旁。

每天下午三点一刻，放学后我拖着装满书本、橡皮屑、棒球和彩色铅笔的帆布书包，走向那栋房子。母亲会来开门，她通常穿着蓝色裙子和毛衣，后来有时候她会穿黑西装和白色立领衬衫，因为她要去看望病患、老人、犯人和新的忏悔者。我是一个满腹牢骚的孩子，心态很不好，一贯觉得生活言而无信，令人失望。而她是一位严厉的母亲——严厉、正直、乐观而慈爱。当她发现我开始显露绘画和雕刻的天赋，便日复一日坚定地鼓励我，

从不过分地夸奖但也从不让我怀疑自己的能力。我们完全不像对方，我认为，从我出生那一刻起就是这样的了，但我们深爱彼此。

很奇怪，虽然我母亲去世得比较早——或者说也许正因为如此——我发现到了中年的自己越来越像她。多年来，我没有结婚但不是完全单身，虽然最终我改变了那个局面。所有我爱着（曾经爱过）的女人都像小时候的我——情绪化、自以为是、有趣味。在她们身边，我变得越来越像我母亲。我的妻子也不例外，但我们很般配。

一方面受到那些昔日爱人和我妻子的影响，另一方面，毫无疑问，由于一份每天向我展示人类内心深处的职业——环境造成的痛苦、先天的异常行为——从孩提时期起，我就克制自己，不让自己友善地面对生活，几年前我和生活成了朋友——并非我儿时渴望的那种激动人心的友谊，而是一种温和的和解，一种每天都能回到我的卡洛拉玛街寓所的快乐。我不时地拥有这么一刻——当我剥开一个橘子，把它从厨房的台子拿到餐桌上——这时我感到一阵强烈的满足感，也许是对于这种原始的颜色产生的满足。

只有在成年后我才做到这一点。孩子应该喜欢小东西，但实际上我记得我小时候只会做大梦。接下来那个梦缩小了，从一种兴趣移到另一种，再接下来我所有的梦被导入生物和化学，我渴望上医学院，最后梦里出现了极其微小的生命片段，它们的神经元、螺旋和旋转的原子。实际上，我开始画得很好的，是我的生物实验室里那些最微小的形状和阴影，而不是诸如山峰、人物或是装着水果的果盘这样的大物品。

如今当我做大梦，是为我的病人，我梦见他们最终会感受到厨房和橘子、跷起腿看电视纪录片的平凡的快乐，甚至我替他们想象更大的快乐，比如拥有一份工作，神智健全地回家同家人团聚，看见房间里真实的一切而不是一张张可怕的面孔。对于我自己来说，我学会了梦见小东西——一片叶子，一支新画笔，橘子的果肉，以及我妻子各个美丽的部位，当她坐着看书的时候，客厅灯光下她眼角闪动的光芒，和手臂上细软的汗毛。

我说过我不是在医学世家长大的，但选择我所从事的医学中的一门，也许并不奇怪。我的父母亲和自然科学沾不上边，虽然他们的个人作风伴随着我的燕麦粥和干净袜子传递给我，强烈地灌输给了他们的独生子，使得我能够很好地挺过艰苦的大生物课程和更加艰苦的医学院——一心钻研和刻苦默记的艰辛夜晚，以及后来相对轻松的在医院轮班的不眠之夜。

我也曾梦想成为艺术家，然而当选择事业的时刻到来时，我选择了医学，而且我从一开始就知道是精神病学，那在我看来既是治病救人的职业，也是人类活动的最根本的科学。事实上，我在大学毕业后也报考了艺术学院，而且令我高兴的是，有两所相当好的学校录取了我。我必须承认，那是一个痛苦的抉择，我内心的艺术情结在同医学作斗争。其实，我觉得如果当个画家，我就不能够做出足够重要的社会贡献，我内心很害怕漂泊，害怕为了谋生而痛苦挣扎。精神病学将是一条直接的途径，可以服务于一个备受折磨的群体，同时我还可以继续画画，我想，只要知道自己本可以当个专业的艺术家就足够了。

我在一次周末的电话中提到这件事，我能够感觉到父母对于我选择的专业深深的怀疑。当他们琢磨着我为自己铺设了什么样的道路，我为什么选择这条路的时候，电话那头沉默了片刻。接着，母亲平静地指出每个人都需要找个人交谈，她用她自己的方式把他们的牧师工作和我的工作联系起来，而父亲则说有很多方法可以驱赶心中的恶魔。

实际上，父亲并不相信恶魔的存在；在他现代而进步的职业中，它们没有出现。他提到它们时总是带着讽刺的口吻，即便是现在上了年纪，当他在乔纳森·爱德华兹等早期新英格兰传教士，或同样吸引他的中世纪神学家的作品中读到有关恶魔的内容，他总是摇摇头。他像是读恐怖小说一样：他之所以看就是因为那些作品令他心神不安。他提到“恶魔”、“地狱之火”和“罪恶”时，总是带着厌恶又迷恋的态度讽刺地说出这几个词；教区居民依然到他的书房里来（他永远不会完全退休），他们内心的痛苦大为减



少。他承认,虽然他面对的是灵魂,我面对的是诊断、环境因素、行为的结果和 DNA,但我们都在为同一个目标而奋斗:终结痛苦。

在我母亲也成为牧师之后,我们家变得很热闹。我发现很多时间我都一个人逃走。我时常看书或是跑到街道尽头的公园游荡,总是坐在一棵树下,画出我显然从未见过的山峰和沙漠,借此分散注意力,抛开心中的不安和压抑。我最喜欢的书不是海上探险就是发明探索。我尽可能找儿童传记读物读——关于托马斯·爱迪生、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艾利·惠特尼等等——还有后来也发现药物研究的冒险:比如约拿·索尔克和小儿麻痹症。我不是一个不知疲倦的孩子,但我梦想着完成某项壮举。我梦想拯救生命,带着某种救命的新发明出现在某个性命攸关的时刻。即便是现在,我也总是怀着这种感觉去阅读科学期刊里的每一篇文章:对于新发明感同身受的激动,以及对于发明者的强烈忌妒。

不能说想当救世主的渴望是我童年的一大主题,虽然,它显然会成为一个美好的故事。实际上,我没有天赋异秉,而那些给孩子看的传记故事到了我读高中的时候成了回忆,在高中我认真完成作业但没有异乎寻常的热情,倒是怀着大得多的兴趣看课外的狄更斯和梅尔维尔的作品,参加艺术学习班,参加无级别越野赛,在三年级那年松了口气,把我的童贞给了一个经验比较丰富的四年级女孩,她说她在上课时一直都喜欢看我的后脑勺。

我的父母亲在我们镇上确实赢得了一些声望,保护、挽救了一个来自波士顿的流浪汉,此人四处流浪,在我们的公园里栖身。他们前往当地的监狱共同演讲,还阻止了一栋和我们家一样古老的房子(建于一六九一年,我们家是一六八六年)被拆除,原本他们打算在那儿兴建超市。他们来参加我的田径运动会,陪我参加学校的舞会,还邀请我的朋友参加教会的比萨饼派对,主持英年早逝的朋友的追思活动。他们的教派中不办葬礼,没有开棺仪式,没有遗体告别,因此我从未接触过尸体,直到进入医学院,并